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二十期 1995年8月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No. 20, August, 1995.

全球經濟中的台灣城市與社會*

夏鑄九

Taiwanese Cities and Society
in the Global Economy

by
Chu-joe Hsia

關鍵詞：全球經濟、經濟再結構、國(民)族國家、都市與區域過程、流動空間、台灣。

Keywords: global economy, economic restructuring, nation state, urban and regional processes, space of flows, Taiwan

*論文修改前曾發表於台灣社會研究七周年會議，台北，台灣大學工綜館，1995年1月21日-22日。

收稿日期：1995年1月20日；通過日期：1995年5月25日。

Received: January 20, 1995; in revised form: May 25, 1995.

摘要

本文由全球經濟形構之角度來理解台灣的社會政治過程與空間轉化的主要趨勢。作者在全球經濟中之亞太區域與產業重構的脈絡上分析台灣經濟再結構的新模型。它由三條線索組成：一、新國際分工與國家提出的亞太營運中心計劃，二、新的社會關係與國家致力於生命共同體建構，三、國（民）族國家的重構與國土綜合開發計畫。至於這個新的社會政治安排所造成的空間轉化特殊形式則分別為：一、全球經濟中繼站的流動空間特質，二、兩極的區域與分裂的城市中幽靈化的“社區”，三、農地釋出可能帶來的國土發展扭曲。

最後，本文指出積累新模型建構的限制在於國家新角色的困難，以及，就社會轉化的角度，作者強調在全球與地域之間的都市政治的重要性，並提出地方工廠的公共空間，進步的地方政府，城市聯盟與草根的社會運動等基地做為施力的支點。

Abstract

This essay deals with the socio-political processes and the spatial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 in terms of the formation of a global economy. The author analyses the new Taiwanese model of economic restructuring in the context of Asian-Pacific regional and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economy. It consists of three elements: 1.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and the project of Regional Operations Center (ROC), 2. The new social relations and the state's national community project, 3. Rebuilding the nation state and the national territorial plan. As to the specific form of spatial transformation shaped by the new social political arrangement, there are three trends: 1. The space of flows as the transmitter in the global economy, 2. The polarized regions and the phantom "communities" in the devided cities, 3. The distortion of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out of the release of agricultural land.

Finally,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e limit of the new accumulation model is the new role of the nation state. In terms of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urban politics between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are emphasized. And the firm centred local communitarianism, the progressive local governments, the alliance of cities, and the grassroots social movements are considered as the sites and the hinges of the resistance or alternative project arising from communities and social political actors.



1. 前言

本文之目的在於指出台灣的社會與政治過程 (socio-political processes) 和空間轉化 (spatial transformation) 的主要趨勢。這個趨勢必須由全球經濟形構 (the formation of a global economy) 的角度來理解，尤其，全球經濟中亞太區域與產業重構的脈絡關係著台灣之城市與社會基本轉化的結構性力量。了解這個歷史轉化是擬定任何能凝聚政治能量的計劃 (project) 時，分析形勢之必需；對於反領導權的計劃 (反霸權的計劃, anti-hegemonic project) 言，在歷史之步伐加速之時，認識形勢深處的矛盾力量與衝突過程，更是社會行動者把握現在，憧憬未來的城市與社會之知識與實踐的動力。

對於近二十年之資本主義再結構(重構) (restructuring) 的研究，若需避免理論的形式化，必需注意區域轉化過程之特殊性，即，文化與政治的變化，辯證地塑造了經濟再結構的過程，換句話說，國家與公司政策的轉移，以及當地社會的動力，是了解具體的，資本主義在台灣所進行的城市與社會之歷史轉化的關鍵。這也就是說，全球過程的結構共同性，和台灣本身具體的社會空間動力之特殊形式，兩者之間的適當連結，是我們考量支配性的經濟與政治利益，和地方社區與政治行動者的抵制力量之緊張關係間，提出另類計劃的知識條件。

全球經濟的形構 (the formation of a global economy) 是本文提出議論的主要理論角度¹。全球經濟的概念並不完全等同於世界經濟 (world economy) 的觀點。世界經濟觀點反映的是大部分歐洲國族國家 (民族國家) 崛起時的老的歷史現實，這些國 (民) 族國家做為十六世紀世界經濟之節點中心而作用。這也就是說，國 (民) 族國家是一獨立自主的經濟實體，各國中央政府在政策制定與執行上有相當大的控制能力。資本主義之積累，由其一誕生起，就是以世界尺度進

1. 全球經濟之概念借用自曼威·柯斯特 (Manuel Castells)，參攷：Castells, 1994。

行的，它也就是古典意義的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形構。可是，資本主義並非過去就是全球經濟（global economy），它是到現在才變成全球經濟的。全球經濟指涉：經濟在整個地球的尺度上，在真實的時間中，作用為一個單位（這不只是國際貿易而是多國生產、流動、交換之組織）。這就是說，資本流動、勞動市場、期貨商品市場、資訊、原料、管理與組織都超越了國與國之間的界限，以及整個地球都完全相互依賴著，然而，這種依賴關係却是以一種不對稱的形式建構起來，全地球不同區域以一種不均等的方式整合起來。經濟系統的主要功能是完全地國際化以及在日常的基礎上相互依賴著，但是，許多其他部分，依其功能、國家與區域，却是片斷化以及不均等地被結構著。所以，全球經濟涵蓋全地球，但卻不針對地球上所有的區域與所有的人民作用。雖然所有支配性的經濟與政治中心是整合在全球經濟網絡之中，而事實上，却僅有少數人是真正地整合在全球經濟之中，並享有權力。於是，社會就表現其自身，將其矛盾與衝突辯証地表現在城市的空間模式之中。

2. 全球經濟中亞太區域與產業重構的脈絡

在當前全球經濟的資本主義技術—經濟再結構脈絡中，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形成仍然是美國做為全球中心的權力地圖繪製。西歐共同市場與統一歐洲計劃則是在技術依賴（尤其是在電子業與電子計算機部門）陰影下，各國（民）族國家藉區域合作以強化自己的競爭實力。而在開發中國家之中，第三世界的分化已成為日益明顯的事實。在新國際分工中，有活力的亞洲新興工業國則以國家之發展取向政策來因應國際經濟競爭之形勢，它可以由下列三個層次闡明：

2.1 爭取高科技的邊緣：技術自動化與生產分散化

在技術自動化與生產分散化的向度上，有活力的亞洲新興工業國的共同特徵為經由政府之政策，以高科技之獲取，集中於爭取更高一

層次的生產技術。在傳統產業中，改採電子自動化設備增加了競爭力，也提昇了工業的結構。我們可以說，新興工業國已逐漸在國際經濟上取得了一個有競爭性的技術邊緣位置，它們已由提供廉價簡單加工的勞工位置提昇為提供廉價工程師的位置。

2.2 搶佔世界市場的狹縫：市場取向的區位政策

有活力的亞洲經濟體之國內市場被迫開放，以及，新興工業國也致力於抓住新市場，作重點投資，搶佔世界市場的狹縫。尤其是一些大公司所未顧及的區域性市場，使得這些新興工業國正能由策略性角度分享核心國家技術革命的一點滋味。相較於其他開發中國家，以及相較於新興工業國二十到三十年前在世界經濟中的工業邊陲國地位，現在，它們已能在工業化的階段上跳躍，取得較重要的地位了。

2.3 高科技提供了全球整合的網絡：電訊系統與多角區位

亞太區域與產業重構之力量使得東亞地區將成為全球經濟中之新中心。電訊系統（telecommunication system）提供了國際資本管理與整合的條件，跨國公司得以分散的多角區位穿透世界之市場，而其整合內部權力之決策却更形集中了。對亞洲新興工業國言，它們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得以重新排列，然而在同時，它們與美國及日本間的技術依賴（technological dependency）的關係却也更深了。

亞太區域與產業重構之力量將東亞地區推向全球經濟之新中心。根據行政院經建會的資料指出：首先，亞太地區，尤其是東亞地區已是當前全球經濟成長最快的地區。1992年東亞地區生產毛額佔世界總生產毛額的22.6%，相較於1960年的7%，增加兩倍以上；貿易類佔世界總貿易額22.6%，估計至2010年時將進一步擴增至33%，東亞地區將成為全球經濟中的新中心。其次，東亞地區經濟快速整合。以貿易額來看，1980年東亞區域內貿易額佔總貿易額38.4%，1987年則增為42.9%，到1992年再大幅上升至49.2%，東亞地區的經濟整合在加

速進行（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1995c: 3）。而上述的經濟表現，密切關係著台灣對大陸與東南亞地區的投資與貿易，這個事實說明了為何台灣中小企業搶在國際政治形勢明朗之前，早已“出去轉轉，賭過手氣”，這是它們創造的現實之一部分。

到了現在，一種模糊的地緣政治觀點替代了過了時的東西對抗，全球經濟日將財富、技術與權力集中於北方的 OECD 國家。美國為保持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積極主導亞太經合會（APEC），召開第一次高峰會議，希望能鞏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至於歐洲各國，也紛紛在亞太地區尋找據點，做為進入亞太市場，尤其是中國市場的跳板與橋頭堡。而日本的學者愛用“雁行模式”的描述，以日本為技術引領與經濟支持的中心，做為亞洲諸國之領航而“和諧地”起飛。聯合國開發總署提出的圖門江區域開發計畫，（TRADP）則由中國、北韓、俄羅斯、南韓、蒙古於北京簽署合作協議後正式運轉，在政治上，這個計畫希望能藉經濟力量敲開北韓大門，化解東北亞長期以來的緊張軍事關係²。南韓提出了 Beseto 計劃，試圖暫時跨過北韓的政治威脅，直接將北京、漢城與東京聯線。而 1991 年，李光耀提出：新加坡必需在自己本身已有的實力之外，展開“區域化”（regionalization）策略，尋求國際合作的夥伴——新加坡自認為“全球的建築師”——深化國際策略聯盟。由於它認定中國的開放將產生不能倒退的巨大能量，因此，幫助跨國企業進入中國就正是新加坡的試金石³。香港的 1997 年大約會在中英爭執中度過，但是沒有什麼有實力的政治體願意讓這爭執妨礙香港、廣州的“省港聯”，甚至擴及整個南中國的利多訊息。1997 年之後的真實挑戰並不在於香港的民主化與否，而在於南中

2. 參考《聯合報》，1995年6月5日報導。

3. 新加坡提供中國與越南經濟發展的經驗是新加坡在國際政治與全球經濟中的獨特角色之發揮，關於新加坡國際化策略之分析，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林右昌同學正在做這面的碩士論文研究。

國區域分工的競爭與秩序⁴。台灣則提出了亞太營運中心計劃(ROC)，試圖以亞太製造業研發的基地，搶佔新國際分工中的技術領先位置。

在全球經濟中，亞太地區的工業化與（尤其是）中國的工業化是與歐美地區的去工業化過程同時發生的事物。中國的工業化及其潛在未開發的市場（而並非僅在於廉價勞動力層次）成為亞太地區與全球經濟不願置身事外（可以擴充生產規模或發揮產能，降低成本）的焦點。在1979年底，中國試圖保有其國家主義的政體開始整合入全球資本主義經濟之中。中國正在“摸著石頭過河”，面對快速而實質巨幅的經濟成長，以及可能發生的人的代價——千萬農民拔離鄉土而又未能整合進入新的都市與工業的世界之中⁵。

而東南亞與南亞在變遷的過程中掙扎求生存，在新世界的秩序中尋求附屬的，然而却還過得去的地位。譬如說，馬來西亞，一方面急著在論述的言詞上撇清與新興工業國的國際分類，避開國際保護主義的威脅，另一方面，却採用類似新興工業國的經濟與工業發展政策，引入外資，帶動成長。並且，以發展政策做為國家來動員社會的利器，成功地壓制了政治上反對力量的挑戰。這種政策不但把中國視為重大的經濟契機而非冷戰時期的政治或軍事威脅，而台資，也就在這樣的土壤下，成為1990、1991及1994年馬來西亞外資投資資金總額之首

4. 香港的轉型是清楚的，它已經由一個70年代的製造業中心的外銷港市，經歷了80年代的服務業中心，現在，它更進一步轉化為金融中心與管理、控制的中心。香港的銀行將廣州的辦事處與香港的部門分工，將低技術的文書和電腦輸入送廣州處理，而香港則負責資訊分析工作。香港政府則著手改善高等教育和職業訓練等提高勞動力素質的工作（霍建文，1995，“香港人民教育不夠高”，《聯合報》，1月23日）。這種經濟分工的權力關係要如何在現有的政治權力關係中運行是1997之後最微妙的地方政治環節。
5. 根據世界銀行在《全球暨開發中國家經濟展望》的報告中預測，東亞開發中國家未來十年的GNP成長率仍將以平均7.6%上升。過去三年全球經濟不景氣，平均成長率只達1.1%，而未來十年將提昇，全球平均約有3.2%的成長率。至於中國大陸，仍為亞太成長引擎的動力來源，成長率將高達8.5%。

位⁶。

在這樣的形勢下，亞洲的新興工業國家本身，威權性的政體也為高度國際化與發展所帶動的社會過程所鬆動。雖然政治的穩定是資本主義發展的要件，然而，威權政體，卻並非如某些新保守主義者所言，是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之必要條件。同樣的，威權政體也並不見得是發展過程的結果。反而，一種較複雜的市民社會的力量逐漸浮現了。

3. 全球經濟中的台灣經濟再結構新模型

資本主義的再結構是保守主義創造的全球經濟邏輯。為了替代 70 年代之結構性危機，壟斷資本利用危機，經由政治上的戰鬥改變了情境。各國經由政治制度塑造了經濟方向，而非經由歷史的必然性。

做為亞洲新興工業國之一員，台灣也在全球經濟的競爭中被迫改變過去的經濟發展模型。這個新的社會經濟模型其實是一種新的社會與政治安排。由於這時正好是國家政治權力結構重組的時刻，國家建立了對社會的新領導權（霸權）（hegemony），然後，國家政策的調整就有主導的作用。以下將已經浮現的社會政治安排，用一個分析性的假說模型分別交待其主要元素，並將這些力量作用在都市與區域過程的趨勢與結果做一說明。

3.1 新國際分工與亞太營運中心計劃

全球經濟中之新國際分工可以由生產過程之重組與勞動國際化過程分別闡述，而國家的回應則是提出亞太營運中心的計劃以突破台灣在全球經濟競爭中的經濟發展瓶頸：

6. 參考《聯合報》，1995年1月24報導；以及，關於台資在馬來西亞的投資模式關乎地方政府以及地域性（localities）的變化，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陳允中同學正在做这方面的碩士論文研究。

3.1.1 全球經濟對生產過程之重組

首先，環境限制與環保運動的壓力、勞工薪資上漲、新台幣升值、催逼台灣跨國資本——企業體的“南進”與“西進”，它們主動發展出全球競爭與求生存的策略，而不坐等國家宣示性高而落實執行緩慢的“國際化”政策。於是，把握中國大陸經濟向全球經濟開放的時機，台資由中小企業擴及大型企業，在市場力量的推動下，加上港資與東南亞華資共同形成了“華人經濟體”之資本流動與網絡，開始鬆動了過去亞洲的政治與意識形態分隔。

其次，做為生產與管理單位的跨國公司，由其自身的競爭策略出發，獲得了高科技之支持，使得它們的決策與掌控權力得以較以往更加穿透於全球各地域。而各地域之實際需要倒不見得是跨國公司考量其策略的著眼點。在美、日、歐的大型跨國公司分擔市場風險與資金壓力的策略中，台灣做為一個新興工業國，正是它們合作的對象。這幾年，台灣企業爭取到 IBM 的採購內容，產品的技術層次確實較為提高，以及，台灣做為美、日、歐跨國公司之“區域零組件供應中心”之數量也增加了，說明了台灣工業的技術水準及生產條件確已漸提昇。即使是高雄楠梓、台中潭子及高雄前鎮加工出口區為例，自 1987 年後逐年遞減的勞動人口也在 1995 年開始止跌回升。尤其是 1995 年第一季的總營業產銷值為十四億四千七百餘萬美元，較去年同期成長近四分之一。呈正成長的行業則包括了電力及電子器械、精密機械等。出口地區也呈二位數成長，尤以香港成長幅度高達四成多，兩岸間之轉口貿易高度熱絡⁷。總而言之，1980 年中期以後台灣的經濟結構確實已經轉變，高科技產品佔出口之比例由 1986 年之 27.6% 大幅上升至 1993 年之 41.6%；同期間，服務業產值佔 GDP 之比例，也由 47.9% 上升至 55.9%，說明了經濟結構的調整方向（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7. 參考 1995 年 5 月 3 日《中國時報》對兩岸轉口貿易報導。

1995c: 2)。

然後，就全球經濟中的台灣農業生產言，國內市場的開放是前述台灣工業轉型與產業升級的必需元素，那麼，除了少數例外，大部分的農產品，尤其是農糧產品的結局就十分清楚了。台灣農村之家庭農業所得早就反映在各項統計數據之中。過去，家庭農業所得不足以維生的情形尚可由中小工廠之家庭外包代工緩和。在 1989 年之後，中小企業外移所造成的家庭可支配所得惡化已進一步擴大⁸。未來，加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 (GATT) 與國際貿易組織 (WTO) 之後，農村將承受更進一步的衝擊，農村人口外流，工農差距與城鄉差距勢將更形加遽。

3.1.2 勞動國際化擴張過程

1985 年起的投機活動與新台幣升值壓力使台灣勞工短缺現象急遽升級。勞工短缺與勞動國際化擴張過程糾結著資本對移民的短期利益與國家管理的壓力，這是長期的社會、經濟與政治問題。

首先，移民多為母國艱難情境下養成之壯年，她（她）們生存能力強，工作態度較積極進取，因此往往被做為生產力的主要來源。台

8. 1994 年 11 月 1 日中國時報的頭版頭條報導：1993 年行政院主計處的統計，台灣地區各縣市平均每戶家庭可支配所得的差距逐漸擴大，其中所得最高的台北市平均每戶達九十五萬五千元，與所得最低的雲林縣僅有四十九萬二千元，台北市高出百分之九十四，差距近一倍。部分農業縣市的所得排名亦不斷下降，而以個人以分配所得要素的總額來看，三大都會區的數額就佔了全台灣地區總額的百分之五十五之多。在 1985 年時，台北市高出雲林縣百分之七十八，這也就是說，九年間最高所得與最低所得縣市的差距擴大了 16 個百分點。此外，台灣省政府主計處的統計，台灣省所有家庭所得高低比較，四十四萬六千戶的農家中接近三成農家被列入最低所得組，每戶年所得只有十九萬七千元。它在 1993 年所得甚至比 1992 年的二十萬元及 1991 年的十九萬七千四百多元還低，這也就是農家這三年所得的不斷惡化。需要補充的是，若再加上消費支出，台灣地區都市消費支出要高出鄉村地區甚多，因此，扣除最終消費支出後，都市家庭之儲蓄為二十二萬五千多元，鄉村家庭則約為二十一萬三千元，相差只有一萬二千多元。在都市中，生活的機能與生存的機會條件較佳，但是卻需忍受較差的生活品質（中國時報，1995 年 1 月 2 日），這其實是開發中國家的依賴城市 (dependent cities) 特色。

灣的製造業、公私工程之營造活動、非正式經濟的運轉……其實都與移民勞工有直接的關係。外勞工作大多投入製造業，主要為紡織業與營造業。在目前的勞工政策下，外勞人數在1994年到1995年之間激增139%，勞委會合法引入之“外勞”大約二十九萬多人（實際取得工作許可人數為二十萬三千多人），佔全台勞動人口的2.3%，加上短期入境，逾時居留非法工作的外籍人士約二、三萬人。特別是有關單位指稱，已有六千名以上外勞逃離工作場所，散處各地⁹。甚至，有些基層勞工運動的工作者估計，非正式經濟中的移民勞工甚至高達為三倍之數，約有八十萬人。

至於移民的長期隱憂在於國家的管理能力與壓力。當移民勞工的管理未能如原先之計劃被徹底執行時，移民定居之後，所有的社會問題、經濟代價、政治隱憂就很容易成為種族主義偏見的藉口了。

3.1.3 國家的亞太營運中心計劃

面對全球經濟中的新國際分工之挑戰，“亞太營運中心”計劃可說是最主要的，國家技術官僚所推動的“亞太經濟戰略”。亞太營運中心的計劃本身，目前雖然還未完全公開，但是前經建會主委蕭萬長的說法早就十分清楚：“除了香港與新加坡已是跨國公司的總部之外，日本大阪、澳洲雪梨、上海浦東、菲律賓蘇比克灣、紐西蘭奧克蘭……等都是台灣的競爭者，台灣將善加利用與亞太各國的密切關係，配合兩岸經貿關係的繼續開展，發揮台灣中繼站的角色，做為歐美國家進入亞洲市場的跳板，開創台灣經濟發展的新空間”¹⁰。簡言之，以亞太營運中心與跨國公司建立策略聯盟，利用台灣經驗，結合台灣資源，進入其他亞太地區經濟體，以達成國際化與產業升級的目標（徐小波，1995；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1995c）。理律法律事務所的徐小波特別指出：台灣企業要扮演整合者（integrator）角色，找尋雙贏策略及

9. 參考趙惠群，1995，以及，《自立晚報》，1995年4月25日報導。

10. 參考《聯合報》，1994年2月9日報導。

具互補功能的夥伴，同時，善用資源，結合資源，擺脫國界限制。跨國公司應善用台灣之優勢與亞太其他國家加強合作。因此，重視市場法則、撤除自我限制、發揮優勢條件可說是亞太營運中心能否成功的關鍵。

在理律法律事務所的建議方向下，1994年6月，經建會依據麥肯錫公司的報告，摘取了民進黨的“國土規劃”——《新台灣地圖》的構想，交換了各部會的意見之後，六個營運中心的構想就逐漸形成了。它被視為台灣由土地改革、加工出口區、科學園區以來，突破經濟發展的里程碑，有改造台灣經濟體質的作用¹¹。行政院經建會的說法是：

- a. 企業層面：以台灣做據點，投資並開發經營亞太地區市場，包括東南亞和大陸市場。
- b. 總體經濟面：以台灣為據點，發展亞太各成員間的全方位經貿關係，使台灣成為各種區域性經濟活動，包括製造、轉運、金融、通信、傳播活動的中心¹²。

由目前行政院院會通過的“發展台灣為亞太營運中心計畫”來看，這確是國家試圖將台灣脫胎換骨的“跨世紀大行動”。它將把握九七之前為三階段中之第一階段，從調整總體經濟、發展六大專業營運中心兩方面著手進行。這六個中心分別為製造中心、海運中心、空運中心、金融中心、電信中心、媒體中心等。為強化台灣發展製造中心的既有優勢，未來十年，將在全省規劃建設二十至三十個智慧型工業園區，由政府與民間共同開發，並以現代化電信網絡連結傳統工業區，形成“科技島”。經濟部針對製造業研發中心訂出了六大布局，其中，加工出口區及中山科學院的轉型是規劃重點。被稱為兵分六路一盤棋的元素是：

- a. 調整研究發展體系，
- b. 整編十大新興工業，

11. 參考《中時晚報》，1995年1月6日〈社評〉。

12. 參考《聯合報》，1995年1月6日報導。

- c.加速加工出口區轉型，
- d.規劃廿到卅座智慧工業園區，
- e.調整國防部中山科學園區為軍民通用發展計畫，
- f.任務編組，單一商口，提供專業投資服務¹³。

亞太營運中心最微妙的環節在於，以“境外轉運中心”的曖昧性突破全球經濟中的“兩岸關係”困境，以及，台灣產業經由國際化而重構。亞太營運中心（Regional Operations Center）的英文縮寫是ROC，它可不僅是一個象徵符號，而是國家最重要的計劃（project），它同時是政治的目的，是技術的方案，以及，也是工業的政策。它首先是政治目標的達成，可強化政治的領導權，然後，致力於科技工業的發展，強化台灣在全球經濟中的競爭力，這已是政策的第二層作用了。

在亞太營運中心的計畫中，國土空間的結構也將配合調整。經建會指出，將來台灣西部可以台北、台中、高雄三大商業中心，配合北、中、南三地的國際機場、港口，規劃三大“生產環境圈”，並藉由縱貫西部的公路、空運及環島海運，使其能整合運作。為了延伸至東部，也將接駁空運及海運，並發展以觀光資源為基礎的產業，以及無污染的高科技製造研究產業。

3.1.4 空間結構：全球經濟中繼站的流動空間特質

將亞太營運中心視為是近年來國家所提出的最有吸引力的計劃並不為過。它由行政院長連戰親自主持跨部會推動小組，在內閣改組後已一步步地落實為實際執行的政治行動與對投資行為之制度性支持了。然而，所有上述“亞太營運中心”的計劃本身的具體內容與推動辦法目前都還止於為媒體上之新聞報導，尤其是在現實社會與政治中的執行能力、法令與制度條件等都還是如此地不確定，“亞太營運中

13. 參考《工商時報》，1995年1月23日報導。

心”的構想之執行必需克服全球經濟中的新國際分工所結構的現實政治與社會力量之挑戰。簡言之，亞太營運中心的構想其實是跨國企業經營組織的新形態。它的成功與否在於跨國公司的反應。這也就是說，它不能再像過去台灣的規劃案，僅是論述層次的語言宣示作用，而必需是真實的制度設計。由於亞太營運中心制度性地擴大了劉進慶所謂的台灣既有資本主義發展方式中，工業化的商業資本特色所造就的“商人資本主義”特性¹⁴，新重商主義（new merchantilism）所形成的親成長聯盟仍然要面對全球經濟中之全球城市（the global city）與非正式城市（the informal city）同台浮現的奇異場景：

全球經濟所孕育的亞太營運中心之執行需要台灣社會與經濟組織的基本改變，這其實是新的都市形構（a new urban formation）的主要力量。雖然台北市的信義區及敦化北路被認為是台北區域金融中心的理想地點¹⁵，但是台北市仍然不見得有機會在現實中真正建構為亞太營運中心的金融中心。在全球經濟中，台北市試圖爭取做為已全球分散化了的經濟活動所需之管理與控制中心。這種區域金融中心是一種特殊的生產基地，被稱為是全球城市¹⁶。全球城市也必需同時是決策網絡中的節點之資訊城市（the informational city）¹⁷。由於全球的權力與影響將集中在少數的世界城市之中，台北市試圖爭取由一個第三世界的首要城市逐漸轉化為一個世界城市（the world city）¹⁸，世界城市是一個城市成為隨國家的發展政策與跨國公司的脈動而變動的城市。同時，行政院“國家資訊通信基本建設推動小組”負責推動的資訊高速公路（NII）期望能提高區域與城市之生產力與競爭力。它

14. 劉進慶，1994。

15. 行政院副院長兼經建會主委徐立德曾如此表示（中國時報，1994年1月14日）。信義區的核心即信義計劃所在地，根據內政部在1995年1月15日發佈的台閩地區都市地價指數，台北市信義區商業區區段再度蟬聯“地王”，每平方米平均地價達萬餘元，每坪2,841,307元（中國時報，1995年1月16日）。

16. 參攷 Sassen, 1991.

17. 參攷 Castells, 1989.

18. 參攷 Friedmann, and Wolff. 1982.

們往往為資訊能力、生活品質、以及主要都會區中心的網絡連結性所決定。這就關係著台灣的城市與區域能否推上資訊城市與全球城市的方向。

全球城市並非可化約為全球經濟的產物，它指涉更深刻的社會結構、內部動力與空間，這也就是說，全球城市是編入全球經濟的指導功能與其決策網絡和資訊處理中心。

資訊城市的特色是流動空間 (space of flows) 替代了地方的空間 (space of places)¹⁹。流動空間關乎資訊、資本、與權力的交換系統，它結構了不同地域間社會、經濟與國家的基本過程。簡言之，時空壓縮，彈性生產，空間區位整合編入全球經濟之中，而亞太營運中心其實就是流動空間的新空間邏輯的表現。電信中心的資訊流動性無需再特別說明。轉運中心對人與物的流動性強調也十分清楚。以金融中心為例，金融活動多半在通信網絡中運作。表面上來看，這些中心確實都沒有地理區位劃分的問題，而是流動性的問題。可是，為何仍被稱為流動空間呢？因為它們確實仍具有空間的物質性，需要在少數選擇過的地域之選擇過的地點安置指導性的中心與相關設施，這就是資訊城市的建構。在目前的亞太營運中心計畫中，金融中心、媒體中心與電信中心都在台北市，而空運中心也是以台北都會區範圍為考量的²⁰。用淺白的比喻來說，做為管理與控制中心的全球城市與資訊城市其實就是“神經中樞”。

另一方面，台北都會區的都市首要化現象也一天比一天嚴重。台北都會區巨大的吸引力不斷地使都會區周邊往外蔓延，吸入人口。台北縣、基隆市、桃園縣，以至於新竹以北都已經納入其日常生活的功

19. 流動空間的概念借取自曼威·柯斯特，參攷：同註 17，以及，Castells, 1992.

20. 由這個層次來看宋楚瑜批評亞太營運中心輕台省而重北高確實不是無的放矢。假如媒體消息無誤的話，亞太營運中心執行的政治過程其實是更有全盤布局思考的。這也就是說，宋楚瑜的批評正是以區域不均等發展為煙幕，以民選省長的政治正當性為壓力，巧妙掩護了台中港做為突破政治禁忌的直航港的設計（中時晚報，1995 年 1 月 13 日）。

能運作之中。以台北縣的情形來看，近幾年台北都會區整體的社會增加率比起 1970 年代言，已經降低了一些，但是與台灣地區其他縣市相較，台北都會區在社會增加人口與總人口增加方面，其比例僅次於桃園縣、台中縣二地區，這顯示了台北都會區因城鄉移民造成的人口成長高峰雖然已經過去，但是台北都會區人口的集中區域仍在持續性蔓延²¹。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的解釋，這是因為房價與生活費用偏高，導致都市中心人口外移，而環繞在都市周圍的地區則是淨遷入現象²²。相對於高雄都會區言，1985 年之後，它與台北都會區的差距即呈現明顯落差。因此，前述的區域不均等發展，即使是台灣第二大都會區，仍然有明顯的所謂“南北差距”的相對挫折感²³，也使高雄繼續成為相對於台北的“不馴之地”。

高科技意識形態是財富與權力集中的精英意識形態的一部分，這種追求生活特殊品味的消費模式與都市某些特定地區之選擇性發展對照著非正式城市的混亂與活力。全球城市中的後現代城市選擇城市的空間將其粧點為娛樂與景象的動員 (mobilization of spectacle)，城市的空間成為消費的私人化地方。在台灣，最有意思的現象就是平行於全球城市之浮現過程中，非正式城市竟然同地並存，非正式化的區域並沒有因為經濟發展而漸弱，伴隨著“工商綜合區”購物中心²⁴的浮現，夜間的 KTV 就是非正式城市的景象動員。非正式經濟在台灣持續擴大，以及，都市服務不足造成了都市非正式部門的持續擴張。原來，非正式城市之建構可以說是台灣之中小資本家、勞工，以及國家，分別根據他（她）們自己的利益與價值，結構台灣為一種依賴社會之

21. 參攷《台北縣綜合發展計畫——總體發展計畫》，1993，“社會構造”部分，pp.22—25，圖 1-1-7，1-1-8。

22. 參考《台灣立報》，1994 年 10 月 20 報導。

23. 《高雄縣綜合發展計畫——總體發展計畫，第二次期中簡報》，1995。（未刊本）

24. 工商綜合區是全球經濟台灣版本的企業園區 (business park)，只是為商業資本與土地資本所催生為購物中心，這是公共空間私人化、消費空間與休閒空間的升級，可以參攷：郭憶嫻，1995。

社會政治過程。非正式建構中的國家角色至為關鍵，它中介於正式與非正式之區分²⁵，推遲了而且模糊了現代資本主義國家所要求的公／私領域界定，讓人人都在這種曖昧的空間中自以為是受益者。而此時，國家之領導權（霸權）却是“經濟發展：GNP 之提高”，提供權力集團現實利益分享與權利聯盟之共識與導向。非正式經濟是無處不在的現象，幾乎可以說是瞭解台灣社會活力與政治微妙秩序的必需角度。由於它關係著台灣都市與社會之結構，值得在下段再做敘述。

3.2 新的社會關係與生命共同體建構

3.2.1 新的社會關係：削弱萌芽的工運與片斷化的社會

前述非正式經濟的蓬勃說明了台灣過去推動經濟活力的主角是中小企業。台灣的中小資本及其勞工，以其活力進入世界市場（過去主要是美國市場），以製造業之簡單加工納入新國際分工。在這個特殊經濟發展模型中，國家對非正式經濟的無能管理、姑息與縱容，支配了台灣的空間與社會之基本形式，它關乎：

- a. 勞動關係之非正式化，這種勞動關係的非正式化，部分關乎社會的依賴性特徵，它有助於資本之積累、勞動力之再生產與維持社會秩序的特殊方式。求生存的“個人”，削弱了傳統意義工人階級之動員。
- b. 勞動關係之非正式化，使得人們無能以正常之薪資在市場中解決都市服務，也無法使人們有能力組織自己，給予國家政治壓力，而得到公部門提供之服務。
- c. 非正式經濟的活力造就了台灣都市生活環境品質的急遽惡化，這也是為何台灣有了工業發展，公共生活環境品質與條件却居然惡化的原因。

25. 參攷：Portes, et al. eds. 1989. 而戴伯芬與柯志明的研究則分別是針對流通領域交換活動，以及生產領域的組織與網絡在台灣的特徵之經驗研究。參攷：戴伯芬，1994，柯志明，1993。

傳統意義的勞工運動在過去的台灣經濟發展模型中既然受到了結構性的牽制，所以，工運一直遲到 1980 年末的政治解嚴才初次動員。然而，這却正是全球資本主義經濟再結構以及台灣的公營企業私人化的時刻。資本主義經濟再結構過程的核心課題是如何能繼續為私人投資創造利潤，為管理創造效率，因此，新勞資關係就是新模型建構過程中的內在必要元素。於是，資方結合所有的經濟不景氣效果，全面壓制工運。勞動國際化與非正式經濟擴大，都使得資本得以削弱工運。同時，高科技與自動化則使計劃得逞。新的模型迫使勞工接受較低的條件，也獲致更高的生產力，增加了資本的利潤，然而，它却創造了職業結構的兩極化。台灣的勞動兩極化因高科技與自動化，以及非正式經濟擴大而加強，助長了社會結構的分化。我們至少可以由以下的趨勢看出：

- a. 專業技術人才的需求提高就業婦女化是政府大力新推動的政策，而職業結構的兩極化却是呈顯了婦女就業的底層化。

經建會指出，台灣地區所得差距有擴大的跡象。雖然較世界大多數工業國家為低，但介於日本與德國之間，高低所得倍數保持在五倍左右。近年國內家庭所得差距的主因包括單身戶與二人戶快速增加，老人或退休者家庭增多、高教育階層益形集中，加上產業轉型，專技人才需求殷切，薪資較服務類人員及農業人員為高，拉大了所得差距（中時晚報，1995 年 1 月 16 日），其實，它在另一方面却說明了職業結構的兩極化。開拓女性勞工就業是勞委會近年政策的重點之一，但是，受到傳統父權保守意識形態的限制，一方面使得 1994 年的勞動參與率男性為 72%，女性才約 44%，而且，婦女因結婚而離職者，竟佔就業婦女人口的三分之一。至於薪資結構上，相同的教育程度與職業，女性薪資比男性少了 20% 到 40%（聯合報，1 月 23 日）。以台北陽明信用合作社為代表的“單身條款”只不過暴露了台灣有了資本主義，但是却沒有“兩性工作平等法”之類的制度性保障。

- b. 服務業之就業人數提高台灣經濟結構中的服務業部門一直保持

成長，它的產值與就業人數都超過了 50%，以及，勞動力婦女化的趨勢與婦女勞動力非正式化的趨勢共存。

台灣工業結構已經明顯地由勞力密集產業外移，而技術密集產業已逐漸遞補了它的空缺，尤其資訊電子工業的崛起及重大投資案的推動（譬如說，國內十家廠商投資 2,310 億進軍積體電路（IC）八吋晶圓市場）（中時晚報，1994 年 12 月 30 日），都說明了產業結構的轉變方向。在 GDP 結構中，服務業所佔的比重已由 1986 年 46.83%，上升為 1993 年的 55.86%，而製造業則由 39.69%，下降為 31.66%（自立早報，1994 年 9 月 25 日）。如果未來亞太營運中心的計畫推展，金融、服務業的比重將進一步擴大。但是，即使勞動基準法制定公布已三年了，像金融、保險、醫療、旅館、飲食、修理、販賣、理容、法律、會計、設計等諸行業都還不能納入適用。同時，在製造業方面，電子業的急速成長也是台灣的特色，但是全球的電子業都是工會化最低的部門。而原有的婦女化的就業趨勢還得加上非正式化的趨勢。原來製造業的正式部門之婦女就業因產業外移而強化了非正式化的現象²⁶，以及，前述移民勞工的擴大趨勢，我們幾乎可以預言一個勞動力兩極化的，它增加了台灣社會的多元異質化與混質化的程度。結果，台灣的社會將提早成為一個片斷化了的社會。

3.2.2 國家的生命共同體建構

面對三十年特殊的經濟發展所結構的片斷化之台灣社會，以及，政治民主化過程中浮現的不同政治力量，國家所提出的最有魅力的計劃可以說是“生命共同體”的提法。這是總統李登輝所提出的字眼，最初，生命共同體因為陳意甚高，在國民黨內就已引起了不同的理解與爭議。除了將其與台獨、彭明敏相聯想之外，甚至還在國民黨的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現階段黨務發展綱領草案中，將“生命共同體”

26. 柏蘭芝，1993，討論了台北都會區邊緣的非正式城市中婦女勞動力的非正式化趨勢。

修改為“同舟一命”，只是用了不同的用詞婉轉地說明“命運共同體”的意思（命運共同體是台大歷史系教授鄭欽仁的用詞）²⁷。

“生命共同體”一詞的核心概念是“共同體”，這是“community”的日譯。在台灣當前的社會政治脈絡中使用，由於外來字的陌生，它的意義並未界定的十分清晰，於是產生了許多曖昧的效果。

“community”被譯為“社區”，在戰後台灣的引入是與聯合國，主要是美國，對第三世界的貧困而又要能避免淪為共產黨的溫床所提出的發展手段，稱為社區發展。在這個脈絡下，國民政府曾在1965年將社區發展訂定在“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大力推動。過去的這種社區發展最被批評的是官方行政體系的形式化與政治化做法，社區發展簡化為硬體的建設。尤其是鄉村地區，社區發展就是蓋廁所，通水溝、加路燈，建一些無人使用的社區活動中心的同義詞。所以，即使根據內政部最近的《台灣地區社區建設與活動調查報告分析》說明，在1991年底止，台灣地區共有4,136個社區，這也與現在討論的“共同體”所強調的內容毫無關係。

對生命共同體的詮釋甚多，無需在此敘述，或許，國民黨中央文工會主任祝基澄的說法可以做為保守派的文化道德論述之代表。祝基澄曾經用儒家式論述詮釋19世紀德國社會學家費迪南·杜尼斯（Ferdinand Tönnies）的社區與社會（Gemeinschaft and Gesellschaft, Community and Society）闡明“生命共同體”，為“具有相同價值體的人們共同組成社區，他們的同質性更高、生活很親密、彼此守望相助、生病相扶持，而且同舟共濟，每一社區的每一份子都是生於斯、長於斯，每個家庭都是彼此合作，他們關心社區發展也維護個人利益，由社區推展到國家再到全世界²⁸”（重點為作者所加）。

共同體的提法要等到文建會副主委陳其南的詮釋與推動之後，才由社區共同體向社區意識建立的方向發展，連結上日本的“村落共同

27. 關於“生命共同體”的計劃，請參攷：黃麗玲，1995。

28. 《自由時報》，1993年？月？日。

體”與西方的市民社會 (civil society) 才有了更豐富的社會空間意義。也因此，日本的町並み保存設計 (community design, 用我們的文化中更準確的意譯應該是“社區營造”)就被視為台灣社區重建的借鑑，因為它有了連結社區參與、地方經濟活力振興與地方文化認同的示範作用。簡言之，社區本身的自我組織、自我經營、自我管理能力就成為社區共同體建構的核心。陳其南指出：“沒有共同體意識，一個社區便不成其為社區。社區社會若無法以共同體的形態運作，不要說地方自治不可能，就連民主政治也無法落實。”然後，他連結上“公民意識”的建立，因為，不如此，“我們就無法發展成為一個現代的社會性國家體制（重點為作者所加），就只能停留於傳統的文化性國家觀念〔作者註：封建中國的文化傳統〕。而公民意識的養成，就只能從社區起步。”（陳其南，1994）²⁹。在台南市的社區文化研習觀摩會致詞時，總統李登輝要求：“國人建立新社會、新國家”，不過他強調：“這不是台獨，而是由建立社區共同體做起，打破傳統的地方觀念和封建的族群意識，讓社區居民以民主方式自治，真正落實生命共同體的理念”。他強調：“現在推動社區文化運動，不只是舉辦活動而已，而是要有實質的共同管理該社區的交通、治安、衛生、停車、環境，讓民眾以自動的方式在同一條路、同一個社區成立民主的組織，真正建立社區共同體，往外擴展後將可以建立城市共同體，然後塑造為**國家生命共同體**”³⁰（重點為作者所加）。由這些話來看，面對台灣的現實社會，社區重建，其實它要求的是新的社會重建，而它需要由人來改造這個依賴社會 (dependent society)，需要一種台灣社會裡的新人類來完成的現代社會之公共空間建構。

3.2.3 空間結構：兩極的區域與分裂的城市中幽靈化的社區

1. 全球經濟所強化的區域兩極化 (regional polarization) 與區域

29. 陳其南，1994。

30. 參考《中時晚報》，1995年1月15日。

不均等發展 (uneven development)

全球經濟之不對稱關係所造就的不均等發展說明了被編入與出局的不同地域之不同命運。它不是形式上地將亞太營運中心計畫中的某些中心之區位均勻配佈於台灣地圖上就能奏效。不均等發展轉換為政治的壓力，或許可以說明宋楚瑜省長為何認為營運中心太忽視中部而反彈。再譬如說，新竹科學園區的成功益發彰顯了與新竹縣、市的差距，未來的新竹科學城計畫執行的關鍵正在於此。過去，新竹科學園區可以孤立發展十二年，可是，未來的新竹科學城，面積七百七十六平方公里，人口達百萬，這就不是可以逃避的問題了³¹。再舉例來說，為了爭取南部科學園區，台南縣與高雄縣之間尖銳的言詞對立。這不但關係著地方政府面對過去三十年經濟發展所造成的“製造業廢墟”時，對“再工業化”的急切與不均等發展陰影的威脅，而且更深刻地關係著全球經濟中的未來外來投資對地域性的影響。全球經濟如何重新催化了地方經濟的活力與生產的網絡，結構了地方的社會關係，改變了地方權力集團的特性，至為重要。甚至，在全球經濟中脫落的地域，像加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之後美濃菸業生產的衝擊，農地釋放，以及對美濃客家文化的危機等，某個程度上，正可說明美濃反水庫運動其實是這種區域兩極化的潛在危機感之爆發。美濃反水庫運動與貢寮反核四的運動等都表現了無權力的地方與無地方感的權力間之衝突，這是未來台灣有權力的中心與地方（地方政府與社區空間）間緊張關係的主要邏輯。

2. 分裂的城市與投機的城市

前面說過的全球城市與非正式城市並非僅僅是富裕城市與貧窮之分，也並非傳統的社會隔離與不平等現象，其現實也無關乎都市邊緣性觀點，而是說，全球城市與非正式城市在同一系統中互動。這種都會區雙元性 (metropolitan dualism) 造就的是分裂的城市 (divided

31. 郭崇倫、陳騰芳，1993。

city)³²。

在台灣，都會區雙元化的結構為投機城市所表現，而破壞性的創造（destructive creation）成為台灣都市空間文化形式之共同邏輯，這也是經濟發展的不對稱性在都市象徵上的表現。外銷導向的製造業所獲取之剩餘，在都市土地投機的過程中，再為土地資本進行積累。台灣的城市成為地方精英財富與收入的主要來源。尤其在 1970 年之後，台灣城市的支配意義就是投機城市。這也就是說，這是一個經由地產交換與營造開發來取得金錢的機器。台灣的營造環境的主要角色就是提供一個地方，它的歷史任務就是連續地摧毀自己來積累貨幣。這種創造性的破壞的對立面就是保存運動³³，我們也可以由這個角度來理解台灣的古蹟保存計畫提出了不同都市意義的歷史作用。甚至，連省政府的台中千城計劃案由代表跨國公司的丹下健三主導，以及，台中市政府為了新廈設計，大費周章地舉辦國際競圖，都可以看出政府以政策引領都市發展，帶動私人地產活絡的角色。

3. 幽靈化的社區

在台灣的政治民主化過程中，相對於過去威權主義國家與社會間的關係，國家支配性價值觀的地域化是其領導權重建時必需的過程。然而，地方社區空間營造所面臨的歷史却是全球經濟的流動空間對地方社區空間的侵蝕，這時刻竟然正是台灣要開始社區重建的時刻。這樣，我們更必需面對徘徊在台灣幽靈，生命共同體計劃中像幽靈般的社區空間建構課題。

首先，目前的生命共同體說法中，社會上層精英的語言仍然是主導，尤其，將社區置於家庭到國家這種靜態同心圓圖象中的推演方式，僅對少數政治團體有效，對為危機所動員的社區運動團體言，它的神話色彩實多於指導功能。社區共同體的建構若不能在國家與資本兩個層次有所警覺，終究難免為社區居民質疑為“利益共同體”。丘延亮曾

32. 參攷：Mollenkoph and Castells, eds. 1991. Fainstein, et al. 1992.

33. 夏鑄九, 1995, 夏鑄九, 1993: 頁 329—36。

經利用雷蒙·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 的關鍵字 (keywords) 取向策略，拒絕為資本之利潤與效率而“經理”社區。他提出：社區，是資本主義灰燼中的火鳳凰。一方面，他肯定杜尼斯所言，在宛如“社區”的社會聯繫的脈絡裡，農民、獵人、工匠或藝術家的工作乃是一種生活方式，而不僅僅是達成目的的手段，對比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異化狀態。社區的生活是相互擁有和享用，以及對共同財貨的擁有和享用。另一方面，他也拒絕了杜尼斯在理論上對立了社區與社會構成，社區的自我再生產之各種形式並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所欲。相反地，社區的維生活動和自我防衛，一貫是對將人類化約為勞動單位之反抗。社區，反對將日常生活的實踐物化為人造物件和文化模式。因此，威廉斯的說法，就可以做為另一種替代性出路的標竿了：在鄉村（過去）、城市（未來）的一般意象之間，兩者之間的生活舞台（現在），乃是社區。當然，在路途的終點，不僅僅是特定的社區，而是整個社會…，它將被宣告為不經濟，而視為多餘的³⁴。

此外，當前台灣社區共同體重建的困難還不在於對社區這個幽靈理念的正確與否。社區重建構想的運用，仰賴於其構想本身內部一致性其實還較少，台灣社會中，推動社區重建的作用者之行動能力，反而是關鍵所在。這也就是說，都市過程（或者說，社會與政治過程，社會空間動力）中社區重建的執行能力才是最重要的環節。因此，國家權力的父權文化性格與國家機器之無能是當前台灣社區共同體重建工作的真正難題。

(1) 國家父權的兩難

社區，無論就其理論概念的核心，或是日常生活經驗的最真實部分都強調的是一般平民的“共同感” (the sense of common) 品質，尤其是一種與“國家” (state) 這類組織起來的領袖階層之集體相區別的，較直接的，社會聯繫的關係之特殊品質。由 19 世紀起，這種直接

34. 丘延亮，1993。陳志梧等編，《古蹟修復技術研討會專輯》，台北：文建會，頁 143-63。

感或者地域性在更複雜與更大的工業社會脈絡中越發受到注意。社區共同體成爲一種另類團體生活的實驗選擇，像法國的公社(commune)

(最小的行政劃分)與德國的城區(Gemeinde)(城區與教區劃分)，它們與社區的想法互動，來表現一種特殊的社會關係，逐漸變成一種社會主義的思想與社會學的思想。尤其在杜尼斯的形式化分類的影響之後，“社區”的用法更是相對於抽象的、形式化的、與工具化的國家與社會的關係，而在於“直接的行動”，“直接的地方組織”，以及，“直接與人民一起工作”…等等義務性工作的涵意³⁵。既然如此，社區共同體重建工作的執行方式需要的是與社區居民直接的、溫暖的對話，而不是透過冷冰冰的行政體系，由上而下，以一種教訓式的精英口吻指導地方居民行事。這種因爲平等而來的對話能力，正是台灣政治民主化過程中最需要的相互尊重與容忍。在目前的社區共同體說法下，多元民主模型假設的國家仍然是個中立的機構。這種不自覺的男性眼光使得它一直看不到台灣社區動員中眾多的婦女參與，社區的婦女成爲無聲的奉獻者了。生命共同體的計畫的目的是要能取代父權文化，然而，歷史的嘲諷是，這却是計畫執行的作用者所最欠缺的能力，因爲，計畫執行者本身就是父權國家。

(2) 地方政府對社區共同體計畫執行之無能

對台灣的社區團體言，它們首先面對的國家是地方政府，台灣的地方政府危機也直接呈現在居民的經驗中。爲歷史所界定的國家，爲了政治的控制，地方政府的角色爲經濟發展的社會政治過程所扭曲。地方派系與地方土地資本利益結合的價值觀成爲地方的領導權(local hegemony)。過去中央與地方權力集團(local power bloc)的政治聯盟模式造成地方自治長期未能落實的特殊性，使得台灣的地方政府不但未能扮演社會福利再分配的機制，更使得地方公共設施品質低劣，基層建設不足。地方政府本身經費不足、權力未獲授權、也無由

35. 參攷：Williams, 1976: 75-6.

吸引人才，僅能消極執行中央與省政府之政策，成為上級政府的“派出所”。社區團體的要求竟然常常需要跨級至中央要求協助才能解決，地方政府長期積弱其實帶來了國家安定的危機，它使國家的制度設計失去了緩衝功能。如今，對台灣社會言，生命共同體計畫的最大嘲諷與無奈，就是由上而下的執行行動，這也就是我們要處理第三個元素的時候了。

3.3 國（民）族國家的重建與國土規畫

經濟模型的危機與重新建構並非一純粹的經濟過程，而是一種社會政治安排。新的國家角色建構的過程可以說是全球經濟中台灣經濟再結構模型中的經濟、技術，社會關係與政治三者之中的最關鍵元素。對台灣的國家言，在全球性國（民）族國家空洞化形勢下，却完成了“中華民國”的國（民）族國家重建。

3.3.1 國家領導權的建構：象徵政治所賦與的民粹民主正當性

政治衝突與國家支配性領導權的建構是認識民族國家重建時的重點。首先，急就章式的福利政策不足以形成國家的正當性。做為一新興工業邊陲，如台灣，在全球經濟的新形勢與內部的政治壓力下，國家的新角色調整一直是多重粗糙而混亂的。當前，在全球經濟的競爭中，公共部門與社會福利已經國際性地與歷史性地被中心國家保守派的領導權去正當化了，因此，不容易再度產生由公共政策的社會性支出來形成對國家的正當性要求³⁶。另一方面，選舉的壓力與政治利益造

36. 福利國家原來是在特定歷史與社會矛盾中的政治產物。國家財政危機是國家再分配（正當性維持）與保持資本積累的需要間的矛盾。在全球性的資本主義技術—經濟再結構過程中，在保守派霸權建構過程與國家之干預方向中，成功地削弱了工運，對社會契約提出了質疑。以美國為例，國家在預算刪除上做了政治選擇，保留了社會安全支付與債務預算，刪除了對國家財政危機言微不足道的社會福利，從而得以放手建造戰利國家（the warfare state）。參攷：Castells, Manuel. 1989.ch.5。或者說，在福特主義轉向後福特主義範型的方向下，建構以熊彼德式工作福利國家為導向的後福特

成了三黨政治的交換，福利政策變成只是短期政治利益的急就章形式了。

其次，中央與地方權力集團利益分享與政治聯盟的模式腐蝕了國家的正當性。台灣經濟發展的扭曲模式之一就是前述投機城市之建構。政府的縱容使土地投機成為外銷財富分配與再集中的過程，於是都市計劃變成擺平地方階級、土地資本、金融資本與營造資本的重要機制。地方的領導權階級（local hegemonic class）是土地投機有關之資本之社會集結，地方顯要（local notable）已在近年權力結構調整過程中，進入全國層次的政治安排所需要的中央—地方政治聯盟。由中央民代選舉、修憲、地方民代賄選案風波來看，國家權力結構的調整已經完成，然而，“金權”與“黑道”對政治的干預已經腐蝕了國家的正當性。

再來，國家支配性領導權重建的最重要的環節其實是總統李登輝以“主權在民”所表現的“民粹主義”的作用。他在黨內保守的政治力量與民進黨為代表的“台灣共和國”創建的雙重壓力下重新復活了國民黨，善用其具克里斯瑪的個人政治風格，他用宗教的語氣說：“釘上十字架以後再復活”，“修行以後，我們發現新的世界”，他說，這是“歷史的新開端”³⁷。最近，他提出“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做為新的政治號召。他說：

幾百年來，台灣曾經先後遭受東西洋帝國的殖民統治，也曾經遭受祖國大陸的無情遺棄。在台灣的人，始終被歷史的命運所擺佈，始終沒有機會和權力決定自己的命運，長期以來潛藏著一股深沈的悲情意識。光復後的半個世紀以來，這塊土地上匯聚著來自大陸各地、海外以及本土的眾多精英人才，歷經共同生活與共同命運的融合，已經逐漸孕育一塊嶄新的文化生機；加上台灣

主義國家（the Schumpeterian workfare state as the post-Fordist state），參攷：Jessop, Bob. 1994: 252-79

37. 《中國時報》，1993年1月6日。

地理位置的特點，更成為大陸文化與海洋文化交匯貫通的樞紐。在多元文化長期而充分的輻輳整合下，使台灣在整個中國文明的總體發展趨勢中，躍居為最先進的新生力量，成為中國文化的‘新中原’。今天，正是我國走出歷史悲情，攜手同心，徹底融合族群，為‘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而開啓新機運的空前良機。³⁸

這裡想要著重指出的是，相對於1949年那次中華民國的重建，假如沒有意外，未來的總統選舉僅僅是象徵性的完成儀式，總統李登輝已經完成了對“中華民國”這個國（民）族國家的重建。不同於經驗主義的提法，這裡強調的是國（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的理論範疇。這裡說明的重點並不在於政治策略，雖然它成功地在“台灣共和國”與“國民黨保守的政治勢力”的對立之間吸收了大部分的政治資源。這裡的說明更不在於憲政國家制度打造的完善與否，或其政治宣示的黑格爾式哲學深度如何，以及，這裡也並不排除這一回民族國家重建的具體性格還未完全定型，仍具有社會實踐的塑造餘地。在這裡要追問的是，在全球經濟中所空洞化了的民族國家中央政府的作用，它最重要的功能竟然是象徵政治所賦與的民粹民主正當性（popular-democratic legitimacy）：讓我們來選自己的總統！

3.3.2 國土綜合開發計畫：農地釋出

1993年7月，行政院核定的“振興經濟方案”中，指示經建會檢討修定“國土綜合開發計畫”及研擬“國土綜合開發計畫法”。面對全球經濟的競爭下亞太營運中心之佈局，社區共同體之建構，以至於國（民）族國家之重構，行政院經建會所提出的國土規畫之歷史任務需是全面領土發展（territorial development）的重新布局。台灣過去經濟發展過程中，由於對土地政策的失控，與對都市與區域政策之忽視，造成了今天土地投機問題惡化、自然生態的破壞與國家公共政

38. 《中國時報》，1995年1月15日。

策間的嚴重衝突。過去形式化的實質空間藍圖式的計畫與非政治性的區位理論當然無法了解國土規畫的角色，它也不該消極地淪為部會間既有計畫的彙編，而需引領都市與區域政策的方向，這其實是當前政府的產業政策、科技政策、文化教育政策的總體表現。在四月初的國土綜合開發研討會中，行政院提出了三項原則與七點政策方向。這三項原則是：加強生活環境的改善，生產環境的建設和生態環境的保育。而七點政策方向是：

- a. 釋出農地。
- b. 指定限制發展地區及可發展地區。
- c. 建立土地發展許可制。
- d. 以縣市綜合發展計劃，落實生活圈建設，縮短城鄉差距。
- e. 鼓勵民間參與（投資）。
- f. 簡化規劃層級（最主要是簡化了省的層級）。
- g. 制定國土綜合開發計畫法。

國土綜合開發計畫以民國一〇〇年為目標年，將台灣地區未來的空間形式描述為³⁹：

- a. 生活空間：台灣地區規劃為廿個生活圈，每個生活圈內的居民都可以在合理的空間範圍內，滿足日常生活中有關工作、居住、就學、購物、休閒、醫療等活動的需求。同時，透過便捷的交通運輸網，居民也可以在卅分鐘內到達中心都市，得到較高層級設施的服務。
- b. 生產空間：發展台灣的亞太營運中心，變成歐美先進國家進入亞太市場的門戶。將台灣地區的經濟活動集中在西部走廊和東部帶狀發展，並形成北部、中部、南部三個都會帶，東部除部分發展為無污染的生產活動外，仍保留相當多的自然保育及休閒渡假空間；離島地區主要也做為自然保育及休閒渡假空間。

39.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1995a: 13-14。

c. 國家公園、自然保育區、人文景觀地區、優良農田、潛在災害及國防安全地區，都應該限制發展，保存其自然狀況。

上述的空間配置，則依國際階層（亞太營運中心）、全國階層（西部成長管理軸、東部策略發展軸、及離島振興區）、區域階層（北部、中部、南部三都會帶）、與地方階層（二十個生活圈）來架構。而其規劃與執行體系則簡化為國土綜合開發計畫與縣市綜合發展計畫兩級。至於區域計畫則以解決功能性特定區域計畫（如水質保護、垃圾處理等）付之實施⁴⁰。

行政院經建會已決議，將在三個月內研擬“國土綜合開發計畫法”草案，完成立法程序；並在六個月內修訂完成“國土綜合開發計畫”，提報行政院核定⁴¹。可是到目前為止，經建會出爐不久的國土綜合開發計畫除了農地釋出這部分，像是真正打算推動之外，其餘部分還看不出行政院真正著手執行的意願。農地釋出的壓力已經迫使行政院農委會迅速表明無意吃力不討好地劃設特定（或是優良）農業區。即使參攷日治時代當初已劃好了的農業用地區位，農委會仍然避免承受所有政治的責難，提出劃設優良農業區之三難：標準難界定、農民反彈、無財力補貼。農委會的這個政策宣示，似乎已迂迴地表示，台灣的農業政策已經打算轉向，農業結構也勢必調整了。

3.3.3 空間結構：被扭曲的國土發展

雖然經建會勾勒了未來國土之空間結構，然而，面對加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後的農業與農民壓力，以及年底開始的選舉，這一次國土綜合開發研討會却被視為是替農地釋出背書⁴²。針對技術官僚規劃論述，我們固然可以討論下述的規劃理念與技術問題，像：農地釋出對經濟政策中農業政策的衝擊，放棄了維生經濟而進一步納入世界市場

40.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1995b: 19-22。

41. 參考《自由時報》，1996年4月20日報導。

42. 黃創夏，1995: 64—7。

後，却因未來國際糧將進入賣方市場所需面臨的可能糧價波動與社會危機⁴³；以及，農地釋出對土地市場的衝擊，土地利用，都市與區域發展模式的可能改變；或是，做為配置集體消費（collective consumption）依據之規範性理念的生活圈劃定，將就了現況下的行政區畫，譬如說，對現有台北、高雄兩首要城市的無奈（對屏東、基隆、桃園…等生活圈的扭曲），台南縣“新營生活圈”的空洞化…；以及，漢族中心主義將原住民問題簡化為“保留區”土地權屬的問題；還有，開發許可制執行的制度條件和社會對發展與回饋的共識等條件還未成熟，開發許可制對引導都市與區域衰頹地區再發展的市場效果國外過去的經驗並不見佳等等，然而，本文却想指出，除了上述這些具體的技術問題之外，國土綜合開發計畫的執行（即使已簡化為農地釋出）是我們最擔心的部分。

經建會在時間壓力下並未對實際執行有任何一點嘗試，所有的規劃用語都純粹是語言表徵層次虛構的象徵實踐，與真實的城市與區域還未開始互動。以目前台灣各地區農地價高，有行無市的情形來看，目前的農地釋出的現實政治考量確實是以農民對土地出售的短期想像來交換政治的忠誠。這也就是說，因農地釋出的民粹政治利益的衡量而放棄了國土重構的歷史任務。尤其，農地釋出與土地發展許可制之實施，主要執行者在於為不均等發展所苦，以及，長期行政能力不足的地方政府。因此，國土綜合開發計畫所推動的農地釋出將會有兩種可能的結果：它不是因為政治上的執行困難（壟斷性私人人工地資本的壓力），再度淪為紙上的宣示，就是在民粹政治壓力下，全面釋出農地。考量未來執政黨在選舉時的競爭壓力，後者的可能性甚高。

然而，無論是前者或後者，均說明了規劃的關鍵元素總是在於執

43. 經建會經濟研究處根據 World Waech 研究所的觀點指出，中國大陸未來四十年內，將因人口高度成長、經濟發展及國民所得提高，發生嚴重缺糧及農地不足問題，預警大陸龐大的穀物需求，不僅將帶動未來國際糧價上漲，並可能發生缺糧危機，造成國際糧價將進入長期的完全賣方市場（《中時晚報》，1995年5月6日）。

行之能力而不在於規劃理念之正確與否，這是百年來資本主義城市之都市規劃專業者最難堪的規劃史教訓。目前省與縣市政府的真實政治情境是，完成了歷史上第一次的民選省長後，省長的規劃權力却竟然為國土綜合開發計畫法所虛級化，這竟然與民進黨版的國土規畫廢省理念本身不謀而合。更為嚴重的是縣市政府的地方政治特殊性，它勢將全面扭曲許可制制度之原意。

國土規畫的農地釋出的構想才剛剛提出，未來是否會，以及如何會將國家領土之發展 (national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扭曲為國土之災難與自然生態環境之危機，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課題。在流動性（資本、勞動、商品、資訊、技術、聲音與影像的流動）的力量與不均等情境下，土地擁有者對投機的渴望所拉扯的力量之間所犧牲的就是國土。果真如此，“破壞性創造做為流動空間效果之極致”倒真是對去政治的國土規畫規劃專業者最無情的嘲弄。

4. 想像未來

4.1 積累新模型建構的限制——國家新角色的困難

前面架構出的台灣經濟再結構新模型已經開始運行。國（民）族國家的重建已接近尾聲，它是推動模型力量的核心，可是其領導權的建構却是象徵政治所賦與的民粹民主正當性；亞太營運中心的計畫是主要的政治與經濟的計劃，以全球經濟中的中繼站，期望突破國際政治的僵局；然後，以生命共同體的主張，由社區推演至城市，以至於國家之重建。相對於台灣的社會，這些計畫由國家所發動，然而，它們仍都需要在執行的過程中檢驗其成效，尤其，這個模型的內外有限制值得我們在想像台灣社會與城市之未來時，做為參攷：它的難處在於象徵政治仍然需面對歷史尷尬、全球經濟的真實和地方的政治動員。

這個積累新模型建構的難處在於全球經濟競爭與不均等發展矛盾

最後都轉化為政治的力量，它的主要焦點在於新積累制度，它要求國家的新角色，簡言之，這是一種新熊彼德式企業家隱喻。它不但不是要求大有為的中央政府，相反地，全球經濟對國（民）族國家中央政府空洞化趨勢大致朝雙元方向發展。一方面，為了有能力左右全球經濟，提供有調節作用的策略性影響，超民族的國家機器（supranational state apparatuses）正在被打造。而另一方面，地域國家（the local state）有了新的可能性，在地方的供應面條件上提供熊彼德式競爭性的支持⁴⁴。這種要求對台灣現階段的民族國家言，既是一種否定自身的“過渡”，又是一種具有內在活力的更積極前瞻表現，這還要更大的社會與政治的力量來完成其轉化。

首先，具體來說，回應全球經濟競爭中的技術創新競爭力是熊彼德式企業家的核心要求，因為，不進則退，這就是台灣工業結構在全球經濟中的“老二危機”（施振榮用語）。

全球經濟中技術升級的壓力與創新性氛圍（innovative milieu）創造的難處是需找出全球經濟中，競爭日烈的台灣產業技術發展困境、提高生產力投資、支援性投資、行銷投資的突破，尋求企業聯合組織的可能性。台灣的企業其實已經具有在全球競爭中的條件了，但是，對政府所提供的制度上的支持言，還並未由亞太營運中心目前描述目標時所用的“語言”轉換為真實的制度設計。

其次，對現階段台灣的國（民）族國家之國家機器言，最關係全球經濟中的國際政治，以及，最微妙的可做不可說的部分就是政經分離的兩難玄機（Catch 22）。

編入全球經濟（台灣是全球經濟的傳輸節點）與適當且微妙的政治自主性保持是利潤之源。如何往整合一體的長遠方向前進中保持台灣的自主性是需施展智慧的地方，可以肯定的是，必需拋開泛政治化了的，過了時的國（民）族國家意識形態干擾（譬如說，統獨意識形

44. 參攷：Jessop, Bob. 1994: 251-79. 其中有關民族國家空洞化的討論。

態)。意識形態之所以是意識形態，可以想像拋開它的困難。至於台資因政治條件而對東南亞與中國大陸所造就的過度剝削問題，對地方社會關係，尤其是階級關係的改變，從而所引發的文化反感，都將持續加強了模型運作的困難。

然後，對現階段台灣的國（民）族國家言，它更大的困難其實還在於它自身。前面所架構的模型中，國家所因應的計畫之執行都面臨國家官僚制度上執行能力之不足：

傳統民族國家中央政府宏觀調控策略已經力不從心，失去了在 90 年代全球產業競爭中的新角色，或許，像資金抑注、人才培育與吸引策略才是可以用力之所。舉例而言，公共政策反而應該辨明新浮現科技在策略上的重要性，鼓勵能讓技術能在整體經濟中擴散的計畫，尋求鼓勵新產業，技術能升級的公司，裝設先進傳播網絡，提供協助給能創新但有風險的企業家，在新的知識能力與技能領域提供訓練、教育之投資。在目前台灣，這樣的做法對於並未建立現代文官體系的官僚言還有難以行動之苦，才會要由中研院院長李遠哲來組織民間機構協助推動。

對國家的整體官僚體系，1994 年行政院外籍科技顧問在年終檢討會上，曾經公開批評台灣的官僚體制如不改革，將危及經濟發展。國外的媒體，也認為台灣官僚體系的腐敗，僅次於菲律賓、印尼、泰國之後，這些確實顯示了國家機器的危機⁴⁵。

文官體系對國家政策之執行能力本來是開發中國家的政治與社會結構性向題，而台灣的官僚行政體系，可以說早已成了過時之體制，無能勝任變局的改革要求。由於官僚的社會邏輯就是組織，它的手段就是它的目標。在過去的威權制國家的陰影下，台灣的社會過去一直對官僚組織缺乏社會與政治的控制，於是系統就變成了封閉的系統。在社會資源、政治權力與官僚組織的任務之間已經失去了關聯性之

45. 參考《中時晚報》，1995年1月17日，“社評”。

時，其實我們應該說，這是台灣官僚系統功能的結束。在台灣，官僚是擴充國家特權的方式，它指向一個更大的領域——官僚階級的形成與創造。官僚階級由社會取走財富，由政府的工作與位置來消費它。官僚政治的特色就是搔不著癢處，企業政府僅能是學者的建言，因此，政府行政革新的結果就是效率更低落。它的和平改革之路的關鍵正好在於“社區參與”，以避免官僚階級耗盡了社會創造的財富。

最後，全球政治經濟力量與地方所獲得的機會間不均等的連結是空間結構與動力的來源，坦白地說，僅有少數地方能有緣享用美好時光。全球傳輸節點之流動空間之支配性與地方空間（台灣是可居之地）之間的張力將一直存在，成為主要的政治動力。全球經濟中之資金若僅以國際熱錢形成回流，這就是說，台灣做為投機城市就將是冒險家的樂園，失去了調節機制的台灣將淪為炒作的機器，失去了建設地方的意願與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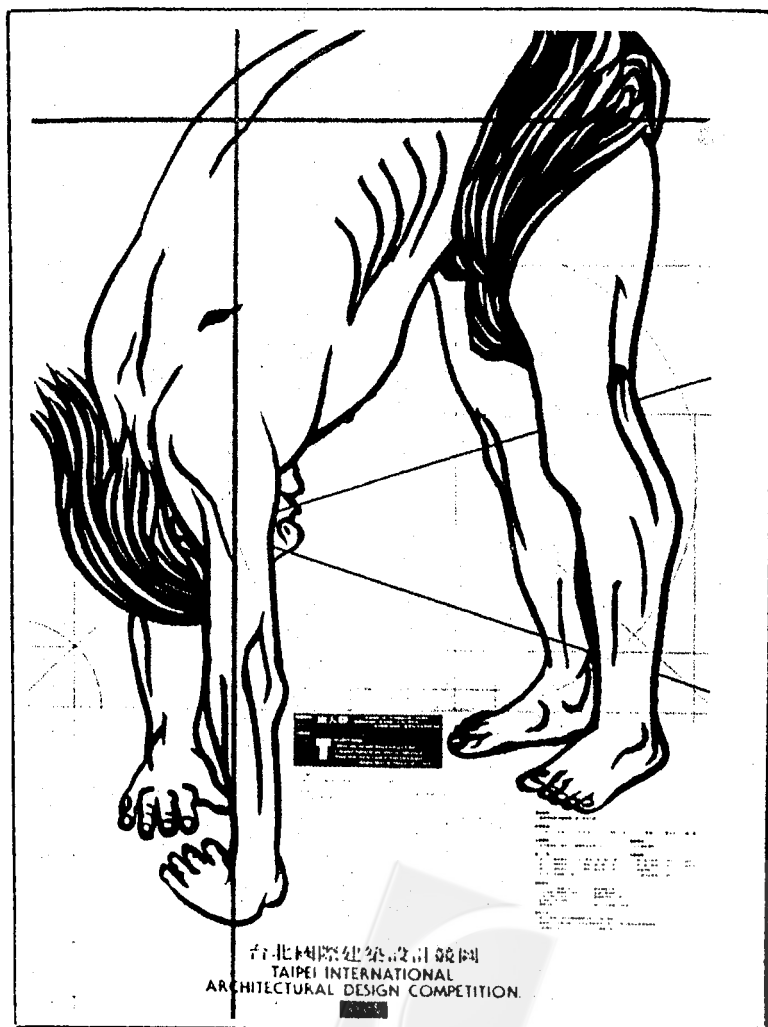
流動空間的巨大能量把人們變成了不同程度的“旅人”。由這個角度思考，由台灣機構舉辦號稱首次的國際性建築競圖比賽的題目就十分耐人尋味。室內雜誌舉辦的競圖比賽題目是“旅人驛”⁴⁶（圖4-1）。在“旅人”與“驛”的對立體中，旅人表達了流動空間中經驗的轉換，而轉換中的某一點才是人類的庇護，也就是“驛”的意義。全球經濟形構中台灣城市的象徵就是“旅人驛”。

曼威·柯斯特曾經用巴塞隆納國際機場航站設計與馬德里的高速火車站這兩個資訊社會的新“驛站”來釋明後現代主義之新支配性意識形態的表現：“在流動空間中歷史終結以及廢撤了地方(place)”。

“因為只有我們在歷史的終點，我們才能混合所有過往所知的一切。因為我們不再屬於任何地方，任何文化，這個後現代主義的極端版本才會符碼化其符碼斷裂邏輯於任何地方的營造事物之上。文化符碼的

46. 關於1995台北國際建築設計競圖之資料，參考《室內》，第38期，三月／四月，1995，頁117-63。這次以“旅人驛”(Traveller's Refuge)為主題的競圖揭曉，並列第一、第二名的設計作品之一是“方舟”，王為河設計。

圖4-1 旅人驛競圖海報一角



解放事實上潛藏了逃離歷史根源的社會”(Castells, 1992:19)。

流動的功能與定著長居的深層需要之內在矛盾表現為對“船”的想像。這個台灣第一次的國際性競圖的第一名作品竟然就是“船”。台灣空間與社會的象徵可以表現為對船的想像。做為西歐 16 世紀以來的重要經濟發展工具，船支持了資本主義的擴張，象徵了殖民者的流動力量。米歇·傅寇 (Michel Foucault) 早就提醒我們這種特殊時空所架構的異質地方 (heterotopia) 擁有最重要的想像。若文明中無船，則夢幻枯絕⁴⁷。然而，做為曾經被殖民的第三世界，如台灣，我們還要進一步追問傅寇所沒有能為我們提出的問題：台灣做為為資本與技術所趨動，為資產階級所暫時主導的流動的空間，它最終還是不能動之舟，也不是聖者之“方舟”。當漢民族農業定耕的文化在目前台灣一再為了對比與文化母體中國的斷絕而以“海洋文化”自況時，可以肯定的是，它與台灣唯一且真正的海洋文化——蘭嶼的雅美（達悟）文化無關，而與費正清當年所創造的隱喻較相近：西方文明伴隨著帝國主義陌生人之船艦在東南扣門，與古老的大陸文明接觸。今天，將台灣自況為船，這是“新興民族”之船，它固然一時滿足了南進與西向海盜的探險，但是却終需面對被劫掠者的反撲。至於如何避免貪婪帶來的災難？已不是道德上的自我設限所能為功，相反地，或許在於順應時勢，帶動整個台灣社會的轉化。也唯有我們由社會轉化的角度放眼未來，下面對都市政治行動者的作用基地之初步想像，才能不拘泥於形式上的因果關係，肯定其啟發性作用。

4.2 社會轉化——在全球與地域之間的都市政治

費南度·卡多索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說得好：共產主義在資訊年代中的瓦解並未表示如法蘭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所說的那樣是歷史終結，而是政治與經濟關係的衝突……新

47. 參攷：Foucault, 1967/1986. 中譯文參攷：陳志梧譯，〈他異空間〉，夏鑄九、王志弘編譯，1993: 399—409。

的民主政治形式浮現的過程，一如文藝復興或是工業資本主義年代，使得資訊年代政治狂亂喧囂……⁴⁸。在台灣，當前支配政經利益發動者之施力機制在於國（民）族國家重建與民粹政治，它反而使得民進黨與新黨都淪為相對而言是被動的政黨。過去知識分子的角色也急遽地分化，直接投身政治，迅速奪取權力位置之新參政者和智囊型的技術專家兩者已成為主要的類型。對台灣社會的政治文化言，原有薄弱的公共空間急需重構，批判性的知識分子需要有別於前者們，以全球視野提出新的發問角度，拉開知識空間。這種面對台灣社會的新疑旨（new problematic）與新論述（new discourse），也是建構政治文化新範型的能力，是台灣社會的知識分子能否建立批判傳統之關鍵。有別於過去清議型之知識分子，安東尼·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提醒我們組織型有機知識分子的角色，以及，制度中的裂縫空間。

積累新模型的張力存在全球經濟的流動與不均等發展下的地方之間，而國（民）族國家中央政府的作用又歷史地受到了限制，它是模型的裂縫，可是，這種都市與地方的危機却也是社會轉化的機會，它可以有一些基地做為施力之支點。

4.2.1 在彈性分殊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基礎上的地域工廠之公共空間

為了保持全球經濟中之技術創新優勢，企業國際化應有巧妙的制度調節。這指的是在勞工運動的社會力量下，國家的制度也以集中於勞動力轉業、再就業、再教育等，以保持勞動市場之彈性。台灣的中小企業在全球經濟中已經有了彈性分殊化的條件，這時，未嘗沒有機會推向地域性的小工業區所形成的：以公司為中心的地域公社主義（a firm centered local communitarianism）⁴⁹，用今天台灣的白話來說，就是工廠社區主義。就這個角度來說，政治可不只是政府的政

48. 引自：Carnoy, et al. 1993: 13.

49. 參攷：Amin, 1994: 26-7。

策，它涉及某區域與某部門的“公共空間”，提供公司，勞工，官員與政治人物互動與合作的空間。

尤其針對過去台灣的社經結構與今天台灣的現實政治動力，國營企業的私人化（不是什麼民營化）趨勢值得提出另類計劃——國營工廠向地域工廠轉化。工廠社區主義提供了轉化資本主義“公司”組織時，想像以網絡相互連結的新社會組織可能性，地域工廠之公共空間值得做為與政黨合作的籌碼與未來在資訊社會中轉化社會的有利支點。

4.2.2 進步的地方政府的可能性

上述的想像有賴於自主性的地域能成為可能。地方經濟活力的自主性，地方政治自我管理的能力，以及對地方文化的認同感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以此為基礎，日後跨地域間的連結才有突破思想上的本質主義、與政治上的山頭主義與部落主義的機會。

在台灣，前述地方政府長期積弱正是體制最脆弱的環節，最近，歷史性的國家權力結構調整，加上，更強大的，全球經濟之變化與穿透，原有中央與地方權力集團的政治聯盟形成了巨大的裂縫，這就是台灣地方政府的危機，它也是戲劇性的社會轉化的契機。近年來黨外，以至於民進黨縣市長選舉的成果就是這方面的早期訊號⁵⁰，去年底，陳水扁取得台北市的市長選舉，更是說明了地方政府的歷史可能性，以及，另類都市政策之可以施展的空間。以今天台灣地方政府所表現出來遠勝過中央政府的積極性與活力，解放地方政府的手腳與想像力，未嘗沒有“台灣過唐山”各顯神通的實力。那時，各地域的發展將推動新的東亞國際政治形勢。

50. 參攷：夏鑄九，1993：350—61。



4.2.3 城市聯盟：發明新國家

國家的領導權統治建立在一些支持性的意識形態、傳統之智慧、思想習慣、知識方法、工作及社會關係模式之上，整個的結合成為一個歷史集團 (historic bloc)，因此，政治行動必然是圍繞著某些觀念的鬥爭。我們曾經提出一些值得嘗試的假說，有助於反領導權的抗爭：

- a. 將自治城市的市民主義與社區居民自主地自我管理的公社主義 (communitarian) 傳統接枝。發展草根民主的力量，由社區參與過程，使地方政府向社區開放，以促使現有中央政府向地方開放。
- b. 相對於集中式的國(民)族國家，平行建構多元進步的地域國家 (local state) 落實直接民主、活化地方經濟、建造地域認同。
- c. 相對於跨國資本的流動性，以自治的地方政府突破國際政治中的僵局，推動城市之間與地域之間的聯盟，發明新國家⁵¹。

4.2.4 草根的社會運動

我們之所以能夠提出假說，發明新國家，主要是基於對當前都市及地域之危機，以及，因此而崛起的，草根的都市運動與地域運動之分析。這些社會運動主要來自：

- a. 因都市服務不足所引發的集體消費爭議，
- b. 因地方文化認同而動員了社區，
- c. 市民對自我管理的期望，
- d. 對地方發展未來出路的展望凝聚了地方社會動員的力量，

等四條相互糾結的線索。尤其是面對壟斷性土地資本所主導的地方權力集團，都市社會運動正是土地資本炒作利益所催動的對立產物。而全球經濟所激化的地方不均等發展，則開啓了地域運動的契機。這些戰鬥提供了社會力量穿透地方政府的可能性。

51. 參攷：夏鑄九，張景森，1994。

在所述全球經濟再結構、政治權力重組、與區域極化所造成的國家的危機，將使台灣的支配化階段的霸權難以穩定，正因為霸權的不穩定，統治群體必須以這樣或那樣的計劃來組織市民積極的同意（active consent）（而不可能再用脅迫〔coercion〕的方式了），在組織市民的同意的過程中，永遠開啓了市民群眾組織成自主的政治力量的可能性，把握這種機會，都市社會運動將可發揮燎原星火之歷史作用。

根據我們初步的研究，這些運動本身其實並沒什麼本質性的城市／鄉村這種兩元對立思考下的差異。它們共同來自對危機的真實感受。這種動員團結的網絡（solidarity network）就是共同體的形成的關鍵。城市與鄉村的差異倒不如說是既有支配性地方社會關係對動員壓制程度有所不同。在新興的都市之中，居民們早已拔除了原有封建社會關係的羈絆，在動員過程中重新建立起新的社會關係。然而，在鄉村地區中，只要動員的能量夠大，新的社會關係仍然得以改變地方派系的支配模式，建立新的機制。至於動員認同的社會範疇與動員意識的社會結構的討論現在還不夠成熟，但是，與國外的經驗研究却是初步可以對話的，這就是都市與區域過程（urban and regional processes）所孕育的潛力。都市過程所關心的動員之認同並不必然是階級的，它還包括了原住民的族群，以及，性別的政治，甚至，青少年文化對成人文化的顛覆。在現階段台灣草根社會運動，婦女參與者眾多，婦女的議題雖然尚未變成運動的議題，可是，它却有巨大的動員潛力。

值得指出的是，在運動的過程中，一種不同於票箱民主的選舉行為浮現了，它或許是草根民主的特點。他（她）們自信，敢言，與官員間關係平等，對運動團體本身與政黨、媒體、與專業者間的自主性也逐漸形成，簡言之，在聯盟與對抗的過程中，新的遊戲規則建立了起來。我們看到了“新新人類”的創造，他（她）們則創造了城市的歷史。

由他（她）們在運動的過程之中表現出來的價值觀，我們看到了也（她）們自己的主體性，可是，這個主體性是建立在差異性（difference）的確立之上的，而非去差異性，追求什麼終極性的“融合”。對差異性的民主尊重推動了新的社會組織的可能性，資訊科技所支持的訪員網絡說明了新的多元激進民主的豐盛性。

過去，台灣由於歷史與社會條件的限制，公共空間建構所蘊含的現代理性並沒有機會完成，然而，全球經濟又催促著新的歷史時勢到來。公共空間的論述確實需要重構⁵²。或許，我們不敢像二十年前的同志那樣清楚地憧憬明天之城市，但是我們可以更肯定的是：平等對話。因為平等對話，所以，不同社會團體之間的相互對話，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緊張關係是必要的，這不正是都市政治所需要的參與民主的政治過程嗎？

正因為如此，做為反領導權計劃（anti-hegemonic project）一份子的專業知識分子，是有機的，組織知識分子，因為我們的謙遜，但是有社會承諾的干預空間，它有機會改變原有的社會關係。

產業升級與勞動力素質提高所要求的社會結構關係著資訊發展方式中勞動力的特性—體力與腦力勞動的品質。於是，勞動力再生產的條件成為制度組織之關鍵。台灣社會中，都市運動的升級說明了對市民環境品質、公共設施與都市服務的要求，而他（她）們在運動中表現的文化創新能力等是資訊生產的重要元素，即，資訊與創新的氛圍（innovative milieu）形構的條件。這正是地域與城市的具體化，以及，連結地方文化、地方政府、地方經濟活力的鍵結。這也就是說，區域與城市做為新的經濟行動者而發揮作用。所以，市民主義與社區主義必須做為歷史計劃之不可或缺一環。不然，台灣就會成為全球經濟中留不住人才的旅人之鄉。

政治計劃需要走在全球經濟所驅動的經濟力量與它所結構的社會

52. 夏鑄九，1994：21—54。

力量之前，論述之於形勢，是要能創造語言，凝聚士氣，相反地，若是落後於形勢尚不自知，那才真是“台灣人的悲哀”。

歐洲的城市，由於其歷史的特殊性，城市國家（city state）銘刻在他們的集體記憶中，城市國家可能在歐洲國家的創造中復活。“歐洲的城市，因為它們是城市，而非地域（local），能夠在流動空間與地方空間之間，在功能與經驗之間，在權力與文化之間，經理其連結，所以在它們過去的基礎上營造，重新創造城市的未來”⁵³。歐洲的城市與嚐試中的城市國家當然不是政治制度的自然形式，而是歷史的形式。那麼，台灣的城市呢？讓我們想像城市間的聯盟。我們必需先把握都市過程中現況的鬱卒，動員的活力，以及，對明日城市與社會的憧憬。這是台灣社會與空間轉化（social and spatial transformation）的過程。

參考書目

- 丘延亮，1993，〈否思‘經理社區文化’：或教老馬新把戲，幹嘛咧〉，《古蹟修護技術研討會專輯》，陳志梧等編，台北：文建會，143-63。
-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1995a，《國土規劃問答》，台北：經建會。
- ，1995b，《邁向廿一世紀世紀的國土規劃》，台北：經建會。
- ，1995c，《發展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計劃》，台北：經建會。
- 柯志明，1993，《台灣中小型製造業創業、經營與生產組織——以五分埔成衣製造業為案例的分析》，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柏蘭芝，1993，《經濟再結構中的婦女就業變遷與地域空間轉化——台北縣成衣業工廠女工再就業的研究》，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徐小波，1995，〈企業聯盟經驗談〉，八十四年台北市議員研討會，第三場，國際化——駛向廿一世紀的新航標研討會，台北，新翠谷會議休閒中心，3月26日。

53. 參攷：Castells, 1994: 32.

- 夏鑄九, 1995, 〈古蹟保存與社區參與的展望〉, 文化資產, 古蹟保存與社區參與研討會, 文建會主辦,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承辦, 1月6日—7日。
- , 1994, 〈(重)構公共空間—理論的反省〉, 《台灣社會研究》, 第16期, 三月, 21-54。
- , 1993, 〈都市規劃與生活空間〉, 《空間, 歷史與社會: 論文選 1987—1992》, 台北: 台灣社會研究叢刊之三, 329-36。
- , 1993, 〈一個都市實踐的假說——都市與區域過程中台灣之地方政府與社會〉, 《空間, 歷史與社會: 論文選 1987—1992》, 台北: 台灣社會研究叢刊之三, 350-61。
- , 張景森, 〈都市危機、地方政府與都市—地域實踐之提綱〉, 《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學報》(尚未出版), 修改前原文曾發表於〈地方社會與地方政治〉研討會,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暨研究所主辦, 1994年4月23日。
- 陳其南, 1994, 〈社區與國家重建〉, 《中國時報》, 10月6日。
- 郭崇倫、陳騰芳, 1993, 〈台灣的波士頓: 科學城‘三足’待整合〉, 《中國時報》, 11月3日。
- 郭憶嫻, 1995, 〈工商綜合區政策的社會分析〉,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創夏, 1995, 〈掛羊頭的國土規劃祇賣釋放農地的小塊羊肉〉, 《新新聞周刊》, 第424期, 4月16日—4月22日, 64-7。
- 黃麗玲, 1995, 〈新國家建構過程中社區角色的轉變——‘生命(社區)共同體’之論述分析〉,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趙惠群, 1995, 〈外籍勞工過台灣〉, 《聯合報》, 6月21日。
- 劉進慶, 1994, 〈兩岸經濟交流的動態與台灣經濟的走向〉,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演講, 工313室, 3月30日。
- 戴柏芬, 1994, 〈誰做攤販? 台灣攤販的歷史形構〉,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No. 17, 7月, 121-48;
- 《台北縣綜合發展計畫——總體發展計畫》,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1993, “社會構造”部分, 22-5, 圖 1-1-7, 1-1-8。

《高雄縣綜合發展計畫——總體發展計畫, 第二次期中簡報》,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1995。(未刊本)

Amin, Ash. 1994. Post-Fordism: Models, Fantasies and Phantoms of Transition, in Ash Amin eds. 1994. *Post-Fordism: A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26-7.

Carnoy, Martin. et al. 1993. *The New Global Econom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Castells, Manuel. 1994. European Cities, the Informational Society, and the Global Economy, *New Left Review*, No. 204, March/April, 18-32.

——. 1992. The Space of Flows: A Theory of Space in the Informational Society, paper for the Conference on “The New Urban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 1989. *The Information Ci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Fainstein, Susan S. et al. 1992. *Divided City: New York & London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Oxford: Blackwell.

Foucault, Michel. 1967/1986. Of Other Spaces, *Diacritics*, Vol. 16, No.1, Spring, 22-7. 中譯文參攷：陳志梧譯, 〈他異空間〉, 夏鑄九、王志弘編譯, 1993, 《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理論讀本》, 台北：明文, 399-409。

Friedmann, John and Grotz Wolff. 1982. *World City Formation*,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omparative Urbanization Studies.

Jessop, Bob. 1994. Post-Fordist and the State, in Ash Amin eds. 1994. *Post-Fordism: A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251-79.

Mollenkoph, John, and Manuel Castells eds. 1991. *Dual City: Restructuring New York*,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ortes, Alejandro et al. eds. 1989. *The Informal Economy*, Baltimore,

Maryland: John Hopkins Press.

Sassen, Saskia. 1991.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and Tokyo*,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 Raymond. 1976. *Keywor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